

## 當前中國大陸情勢分析

張京育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由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大陸持續動亂的十年。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死亡，同年十月六日華國鋒和葉劍英聯合起來打倒「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大陸動亂並未因此而即告停止；反之，還由於批毛還是保毛問題、路線政策問題、權力鬭爭問題，以及經濟問題的難以解決，而有了新的發展。現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派雖然在對以華國鋒為首的一派的鬭爭中佔了上風，但所有上述的問題還沒有獲得最後的解決，所以中共究將朝那個方向走，這個問題迨至目前還不能獲致一個明確的答案。這個報告打算從思想、政治、經濟三個方面對當前中國大陸情勢提出扼要的分析，以期有助於諸位對中共未來動向的瞭解。

## 一、信仰危機難以克服

最近一年來，中共公開承認在中國大陸存在著三信危機，即信仰危機、信任危機與信心危機。所謂信仰危機，就是大陸廣大人民，包括中共的黨員和幹部在內，根據他們自身的體驗，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徹底破滅，這是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年完全失敗的直接結果。所謂信任危機，就是中國大陸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基於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業已完全喪失。所謂信心危機，就是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共打倒「四人幫」以後所號召的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沒有信心。而信心危機是由前兩種危機引伸出來的。它們概括說明了當前中國大陸人民的思想狀態和精神狀態。由於三信危機的存在，中共又承認今天中國大陸人民一般的思想傾向和行為傾向是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前者蔑視權威和法紀，用中共的話說就是「我要怎樣幹就怎樣幹」；後者只關心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用中共的話說就是「一切向錢看」。（按中共要求大家「一切向前看」，「前」與「錢」同音。）

但是對於共產主義信仰的破滅，雖然一方面消極地導致了無政府主義與極端個人主義的流行；另一方面也積極地引起了自由

民主思想的滋長。這可以一九七八年底和一九七九年春在北平出現的民主人權運動作為代表。正如大家所知，這個運動是由一批知識青年發動的。他們自稱是「思考的一代」。他們以大字報與地下刊物為武器，向中共發出了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呼聲。其中一個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地下刊物「探索」的主編魏京生。他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口號，並指出真正的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水火不相容的，並嘲笑馬克思主義是比狗皮膏藥好一點的膏藥，為此他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被中共逮捕，並在同年十月被判處徒刑十五年。這已經是衆所週知的事了。但是除了魏京生之外，那些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向中共要求自由和民主的人也並未見容於中共。這裏我可以舉出今年四月間被捕的王希哲作為代表。王希哲是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作者。他所發表的有關自由和民主的言論，都是以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作為根據的。他還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香港左派雜誌發表了一篇頗為引人注目的論文「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對毛的錯誤作了毫無保留的批判。這在中共看來，他已經偏離了中共視為正統的理論的軌道，這是「扛著紅旗反紅旗」，所以也就不能讓他繼續發表議論了。中共所逮捕的人當然還不止此。但是中共的鎮壓並沒有使他們歸於緘默。最近兩年，大陸地下刊物在中共嚴厲取締下繼續以各種方式在各地出現，便是一個有力的說明。

對中國大陸信仰危機的分析，不能忽視批毛問題在中共黨內黨外所引起的思想混亂。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肯定的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毛澤東思想代表「真理」，它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打倒「四人幫」以後，華國鋒以毛指定的繼承人自居，在葉劍英的支持下，繼續執行毛生前制定的路線，如仍然強調「階級鬥爭」，仍然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充分反映了這一點。當時鄧小平剛剛復出，沒有表示異議。但是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他就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一個理論問題，要求對毛的錯誤進行檢討了。依照鄧的認識，不管是馬克思主義也好，毛澤東思想也好，都必須在實踐過程中接受檢驗，檢驗的結果，如果效果是好的，它就是真理，如果效果不好，它就需要修改，或者拋棄。鄧的主張，由於受到較多領導幹部的支持，在黨內佔了上風。所以中共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給予高度的評價。當時由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方針，在北平和大陸各地引發了以魏京生等人為代表的民主人權運動，對中共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一派便以此為藉口，對鄧派展開攻擊，認為鄧派的主張「右了」、「修了」。他們拿出來和鄧派對立的觀點，就是兩個「凡是」，即凡是毛的決定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所以有人把兩派之爭稱為「實踐派」與「凡是派」之爭。對於華汪一派的攻擊，鄧派指為思想僵化，乃再度發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予以反擊，同時提出「四項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表示他們沒有向右轉，也沒有「修」。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初步總結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

年的經驗教訓，確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是一場浩劫，同時明白宣告堅持、不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堅持與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分野，說明鄧派在這一場思想鬭爭中又再度取得了勝利。由於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對毛的錯誤已經作了初步的總結，所以去年二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除了爲劉少奇徹底平反之外，還決定起草一個文件，以全面檢討毛的錯誤爲主，總結中共統治大陸卅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準備提交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今年四月十日，中共「解放軍報」發表了黃克誠撰寫的「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對毛的功過作了概括的論述，顯示中共內部對這個問題業已獲致初步的結論，但批毛問題牽涉太廣，黃文的發表並不表示這個問題已經徹底解決。

我在前面曾經指出，鄧派是主張批毛的。但不像赫魯曉夫對待史大林一樣，把毛一筆抹煞。因爲毛在中共的地位等於列寧在俄共中的地位，把毛一筆抹煞，亦就等於否定中共本身。現在鄧表示，整個說來，毛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顯示鄧對黨內的擁毛派已作了妥協和讓步。總括起來，迄至目前爲止，中共對毛的錯誤的檢討，包括如下幾點：(一)階級鬭爭擴大化，文化大革命是它的具體表現之一；(二)反對修正主義卻沒有對修正主義作出準確的解釋；(三)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黨內鬭爭採取了不適當的方式；(四)把自己置於組織和羣衆之上，實行個人獨裁；(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但中共一方面要檢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矛盾的存在，自不能不在思想上爲中共帶來長期的困擾。實際上自從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的暴政，像「土改」、「反右鬭爭」、「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以及不斷進行的鬭爭，無不是毛澤東及中共幹部造成的罪惡。中共今日當權派企圖用輕描淡寫的方式來掩飾毛及毛式共產主義所造成的禍害，非僅大陸同胞不能接受，中共內部許多遭遇到殘酷鬭爭或略有良知的幹部也不會接受的。

綜上所述，中共今天所面對的信仰危機是十分深刻的。現在中共強調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並極力鼓吹愛國主義和建設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圖克服這個危機。不過我們看不出中共在短期內有成功的希望。

## 二、權力鬭爭繼續發展

共產黨人的思想鬭爭，往往是和權力鬭爭互爲表裏的。過去幾年鄧小平一派和華國鋒一派思想鬭爭的過程，也就是他們權力鬭爭的過程。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和「四人幫」被打倒之後，由於鄧的復出，中共的權力結構，主要係由以華國鋒爲首的文革受益者與以鄧小平爲首的文革受害者兩大派系所組成，而由以葉劍英等少數元老所代表的中間勢力在兩者之間起著協調和制衡的作用。由於歷史背景和政治利害的不同，自一九七八年五月鄧提出「真理標準」問題以來，兩派就一直處於激烈的權力鬭爭之中。鬭爭的

焦點，除了前述的對於毛的錯誤應不應該徹底進行檢討之外，還有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冤案、假案、錯案應不應該徹底平反和一個「四人幫」餘黨不應該徹底清除的問題。鄧派主張徹底檢討毛的錯誤，當然也主張徹底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冤案、假案、錯案和徹底清除「四人幫」餘黨。因此鄧派隨著在批毛問題上取得節節勝利，也在中央和地方兩方面增強自己的勢力，削弱華國鋒一派的勢力，以致華國鋒本人也不得不於去年九月間召開的中共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被迫辭去國務院總理的職務，並且接著在去年十二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辭去黨主席的職務，而使鄧派在這一場鬭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華國鋒過去一直在毛的故鄉湖南工作，一九七一年初才被毛調到中共中央。所以他不像「四人幫」，有他自己的羣衆基礎。打倒「四人幫」之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的人，立刻反過來支持他，企圖從他那裏獲得庇護，以保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華國鋒亦正好把他們收集起來，作爲他自己的政治資本。但是清除「四人幫」餘黨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華國鋒想要把那些與「四人幫」有密切關係的人保存下來，自然很不容易。於是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開始迄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止，在鄧派的攻擊之下，有許多中共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因爲過去與「四人幫」保有密切的關係，一個一個被撤換；而接替他們的都是屬於鄧派或傾向鄧派的老幹部。這批被撤換的第一書記包括天津解學恭、北平吳德、遼寧曾紹山、陝西李瑞山、河南劉建勛、河北劉子厚等。而與此同時，鄧派或傾向於鄧派的老幹部，則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大批進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使鄧派在這兩個重要的權力機構中比華派佔有更大的優勢。不過鄧派並不以翦除華派在省一級的勢力爲已足。在這個步驟大體完成之後，鄧派就轉而採取第二個步驟，即翦除華派在中央一級的勢力。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期間，鄧派對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四名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的最得力的支持者的錯誤進行了猛烈攻擊，結果由全會決定解除他們四個人中共黨和政權中的所有領導職務，將華國鋒完全架空，對華國鋒一派可以說是一項致命的打擊。至此，華國鋒已經處於失去任何反抗能力的地位，只有任由鄧派擺佈了。

在清除了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四人之後，鄧派就把鬭爭的矛頭轉向華國鋒本人。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對領導制度與幹部制度實行改革，以糾正過去權力過份集中以及實際存在著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缺點。這項改革包括三個要點：第一，實行黨政分開，避免過去黨政一把抓的弊害；第二，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退休制度；第三，實施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政策。這樣，鄧派就根據黨政分離的原則，在中共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中，迫使華國鋒讓出國務院總理的位置，由鄧派支持的趙紫陽接充。同時，鄧派在這次會議中，還通過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檢討，將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另一名支持者陳永貴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解除。接著鄧派就在去年十一月舉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準備給予華國鋒最後一擊。因爲這次審判雖然沒有對「四人幫」鎮壓天安門羣衆事件正式提出控告，以免公開牽涉到華國鋒。但作爲當時的公安部長，華國鋒顯然無法對這一事件推卸責任；這就使得這次審判對華國鋒形成一股強大壓力，迫使華國鋒最後不得不把黨

主席的位置也讓出來。

鄧派對華國鋒所犯錯誤的指責，大概包括下列幾點：第一，領導「農業學大寨」運動發生偏差；第二，打倒「四人幫」以後繼續批鄧，阻止鄧的復出；第三，提出兩個「凡是」，和鄧派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對抗；第四，鎮壓天安門羣衆有錯；第五，打倒「四人幫」以後搞了兩年的個人崇拜（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的宣傳工具稱華爲「英明領袖華主席」）；第六，打倒「四人幫」以後領導經濟工作有兩年失誤。這最後兩點是在去年年底才提出來的，目的在迫使華自動辭職。現在這件事已成定局，只等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形式上的通過了。

但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是否到此就宣告結束了呢？當然不是。大家知道，葉劍英是支持華國鋒充當毛的繼承人的。現在鄧迫使華國鋒下臺，葉劍英是不同意的。但是因爲鄧派掌握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數，葉劍英只好以避寒爲名，自去年底起遠走廣東，對鄧派進行消極抵制，迄至今年六月還沒有返回北平，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較預定時間拖延了半年之久還未能召開，這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中共現有三千八百萬黨員，其中有一千八百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他們都是華國鋒的堅定的支持者。他們分佈在大陸廣大的基層，是一股鄧派在短期內絕對無法清除的力量。此外，鄧派所推行的幹部退休政策，使一部份原來支持他們的老幹部轉而反對他們，像許世友的長期滯留南京，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加上鄧派取得更大權力後內部所產生的矛盾分化，我們預期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還將在新的情況下繼續發展。

### 三、經濟問題無法解決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一年，不但證明它在政治上是失敗的，同時也證明它在經濟上也是失敗的。一九七八年二月，華國鋒在中共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中公開承認：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中國大陸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大陸人口現有九億八千多萬，其中八億人口在農村從事耕作，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關於發展農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透露大陸農村還有一億幾千萬人糧食不足，便是最好的說明。

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情況，雖然比一九七六年略有改進，但仍然十分嚴重。這一方面表現爲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下降；另一方面表現爲財政赤字之龐大與通貨的迅速膨脹，迫使中共公開承認在經濟中潛伏著危險。根據今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表的「關於一九八〇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一九八〇年大陸糧食產量共計三億一千八百二十二萬噸，比上一年減產百分之四點二；原煤產量六億二千萬噸，比上一年減產百分之二點四；原油產量一億零五百九十五萬噸，比上一年減產百分之零點二。另據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姚依林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所

作「關於調整一九八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收支的報告」，一九八〇年國家預算執行結果，財政收入（不包括國外借款，下同）超額完成計劃，多收七億元（「人民幣」，下同），而財政支出超過計劃四十八億元，主要是基本建設撥款超過二十億元，「支農」支出超過六億元，行政管理費超過九億元，因而全年的財政赤字由預算中原定的八十億元增加到一百二十一億元（按中共一九七九年的財政赤字為一百七十億元，折合一百十三億美元）。由於財政赤字增加，向銀行的透支增多。銀行原來計劃全年增發三十億元票子，實際增發了七十六億元，多發了四十六億元。由於市場貨幣流通量增多，商品供應量未能相應增長，一九八〇年全年平均零售物價同上年比較，大約上漲百分之六左右，其中副食品上漲百分之十三點八（按，根據外籍記者報導，去年大陸物價上漲幅度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情況如此，這就使得中共不得不於去年年底採取非常措施，下令制止物價上漲，同時決定必須對經濟作進一步的調整。

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在華國鋒領導之下，提出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號召，並為此制訂了一個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十年經濟發展規劃，要求一九八五年糧食產量達到八千億斤，鋼產量達到六千萬噸。農業總產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四至五。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以上。此外十年規劃規定，在今後八年內要新建和續建一百二十六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和五個重點港口。但執行的結果，發現這個規劃的制訂低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對經濟的破壞，大而無當，不切實際，不得不予以擱置。現在鄧派攻擊華國鋒領導經濟工作有兩年的失誤，便是指此而言。所以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就決定在經濟上改採「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以調整為主，依照農、輕、重的優先次序，把農業放在首位，做好工業與農業之間、工業各部門之間，以及積累與消費之間的綜合平衡，大力收縮基本建設，同時將經濟權力適當下放到地方和企業，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把主要依靠行政組織、行政辦法管理經濟，改為主要依靠經濟組織、經濟辦法和法律辦法管理經濟，企圖藉此「把經濟搞活，進而把經濟搞上去。」當時中共預定調整的期限為三年。但兩年來進行調整的結果，不但沒有達成收縮基本建設規模的目標，反而因為權力下放，使地方的基本建設大為膨脹，為中共帶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為此中共不得不以大量收縮基本建設為中心，對經濟作進一步的調整，並決定把調整的時間由三年延長為五年乃至八年。從今年年初開始，中共宣佈取消大量與日本、美國、西德簽訂的合約（與日本簽訂的合約被取消的達到十五億美元），同時在農村普遍實行與集體化原則相反的「包產到戶」甚至「包產到勞」的政策，便是大陸經濟業已達到極端窮困程度的具體反映。而隨著「調整」與緊縮而來的，是基本建設的縮小與許多廠礦企業的關閉，帶來失業的激增。根據西方記者的估計，單只城市中失業人口已達兩千六百萬以上，形成極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去年年底，中共在作出對經濟實行進一步調整的決定之前，曾經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對過去卅一年在經濟工作中的左

傾指導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清理，指出過去的錯誤是重建不重生產，重生產不重生活，而且在經濟建設中沒有認清中國大陸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事實，好大喜功，不自量力，急於求成，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嚴重的後果。中共對經濟工作中左傾思想的清算，也是對毛澤東的錯誤的清算的一部份。經過這次清算，現在中共在經濟工作中所推行的指導思想是陳雲的經濟思想，陳雲主張「要退够，三年痛不如一年痛，不要怕傷害筋骨。」但陳雲所開出的藥方究竟能治療中共的經濟痼疾到什麼程度，還得等待時間來加以證明。

根據前引姚依林的報告，當前中共對經濟的進一步調整，首先要爭取做到基本上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信貸收支平衡，同時把市場物價基本穩定下來。爲此，中共決定將一九八一年原計劃的財政收入由一千零七十四億元調減爲九百七十六億元；財政支出，由原計劃的一千一百二十四億元，調減爲九百七十六億元，減少一百四十八億元。爲了實現上述任務和要求，中共決定將一九八一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五百五十億元調減爲三百億元。各項事業費、行政管理費和國防費開支共減少六十四億元。「企業挖潛改造資金」、新產品試製費共減少十六億七千萬元。同時將一九八一年的鋼產量，由原計劃的三千五百萬噸調減爲三千三百萬噸，原油產量由原計劃的一億零六百萬噸調減爲一億噸；煤礦產量由原計劃的六億五千九百萬噸調減爲六億三千八百萬噸。另外準備發行「國庫券」四十至五十億元以及向地方借用八十億元以資彌補。由此可見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中共經濟工作的着眼點，乃在使大陸經濟情勢不要再惡化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四個現代化，只好暫時擱起；而大陸人民想要生活獲得改善的希望，亦就註定落空了。

####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大陸，乃是一幅思想矛盾紛亂、政治動盪不安、經濟停滯不前的圖畫。這是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一年來的結果，它爲我們提供了共產主義失敗的又一例證。目前中共正在掙扎求變，希望從總結過去三十一年來的經驗教訓中找到一條出路。但是我們認爲，除非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它是永遠不會找到一條出路的。這是我們分析當前中國大陸情勢後所能獲致的一個合理的結論。

本文係本中心主任張京育博士於本（七〇）年七月八日向七十年國家建設研究會所作專題演講，特予刊載，藉供讀者參考——編者。